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采取物的立场

——让·鲍德里亚的极端反主体主义思想研究



刘翔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丛书 江怡 主编

采取物的立场

——让·鲍德里亚的极端反主体主义思想研究

刘翔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取物的立场：让·鲍德里亚的极端反主体主义思想研究 /
刘翔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哲学与文化丛书)
ISBN 978-7-5161-1479-7

I. ①采… II. ①刘… III. ①鲍德里亚 (1929 ~
200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6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储诚喜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

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中的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

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②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② 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

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目 录

引言 “物”的哲学家鲍德里亚	(1)
一 鲍德里亚生平及学术分期	(4)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
三 物：鲍德里亚的理论焦点	(26)
第一章 主体的困顿：鲍德里亚极端反主体主义	
思想的背景	(30)
第一节 主体迷信：困境的根源及其发展	(31)
第二节 主体之死：脱困的尝试及其缺憾	(37)
一 上帝死了：尼采的尝试	(37)
二 存在者之为存在：海德格尔的尝试	(41)
三 人之死：福柯的尝试	(44)
第三节 大写的物：一条激进的脱困之路	(48)
第二章 物的上手：符号秩序下主体的入迷	(57)
第一节 符号秩序的形成	(58)
一 功能物体系	(59)
二 非功能物体系	(65)
三 伪功能物体系	(70)
第二节 符号秩序的运作	(74)
一 运作的语境：消费社会	(74)
二 运作的载体：大众媒介	(80)
三 运作的对象：以身体为例	(83)
第三节 象征秩序的退隐：物和主体的诀别	(86)

一	何为象征秩序	(89)
二	何为符号秩序	(92)
第三章	物的增殖：拟真模式下主体的退隐	(97)
第一节	拟真模式的形成	(98)
一	仿造模式和生产模式	(100)
二	拟真模式	(101)
三	拟真模式的社会表达	(104)
第二节	拟真模式的运作	(107)
一	真实之死	(108)
二	色情之死	(112)
三	死亡之死	(115)
第三节	符号秩序的升级：物与主体的对立	(120)
一	从“景观社会”到“拟真”	(120)
二	从“全景式监狱”到“内爆”	(124)
第四章	物的复仇：命定策略下主体的消亡	(128)
第一节	命定策略的形成	(129)
一	命定策略的含义	(130)
二	命定策略的提出	(135)
第二节	命定策略的运作	(140)
一	运作的原则：恶的原则	(140)
二	运作的手段：迷狂	(143)
三	运作的后果：大灾变	(147)
第三节	象征秩序的复归：物与主体的反转乃至交融 ..	(151)
一	“主奴辩证法”和“物的反攻”	(152)
二	消失：物与主体的交融	(154)
三	逼近完美就意味着逼近死亡	(157)
第五章	主体的涅槃：鲍德里亚极端反主体主义	
	思想的地位	(163)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	(164)

一 鲍德里亚对现代性的反思	(165)
二 一个标签：后现代主义者	(167)
第二节 反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	(173)
一 鲍德里亚对后现代性的反思	(173)
二 另一个标签：反后现代主义者	(179)
第三节 虚无主义者鲍德里亚	(182)
一 定义一种“虚无主义”	(182)
二 反对一切标签的尝试	(185)
第四节 “物”的代言人鲍德里亚	(187)
结语：主体何去何从	(195)
参考文献	(203)
外文文献	(203)
中文文献	(208)
后记	(214)

引言 “物”的哲学家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1929. 7. 27 - 2007. 3. 6)^①, 当代法国哲学家, 学术思想足迹遍布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学术流浪者, 危险而引人入胜的思想冒险家, 神出鬼没的理论刺客, 以“消费社会”理论叛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又以“拟像理论”质疑现代性的意义, 有“后现代主义的大祭司”^②之称。迈克·费瑟斯通曾评价说, 鲍德里亚“无疑是后现代主义学者中最极端的一个, 他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推演到了极致”^③。史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 鲍德里亚“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震撼最极端的后现代理论”^④。而诺里斯则视鲍德里亚为“当今后现代主义者中的邪派人物”, 毫不客气地认为, 他是时髦的法国知识界里某些愚蠢观点的始作俑者。^⑤

① 笔者注: 对“Jean Baudrillard”的译法, 国内现存主要有以下几种: 波德里亚、博德里拉、博德里亚尔、博德里涯、布希亚、鲍德里亚等, 本文将通篇采用最后这一种译法。

②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 VIII.

③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 1991, p. 33.

④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1, p. 111. Cited from Paul Hegarty, *Jean Baudrillard: Live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11 Notes.

⑤ Christopher Norris,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2, Cited from Paul Hegarty, *Jean Baudrillard: Live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12 Notes.

然而，事实上，鲍德里亚并不是一直如此“时髦”。可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在法国知识界中仍然处于不起眼的位置。当仅仅年长他三岁的福柯已经获得哲学教授席位的时候，鲍德里亚仍在中学以德语教学为业，而要到1966年他才几经周折成为南铁大学^①的助教。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逐渐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语世界声名鹊起。1988年，英国《卫报》以整版的篇幅介绍鲍德里亚，撰文称之为“社会学教授，天启预言家，歇斯底里的抒情诗人，荒凉的后现代图景的描绘者，当下纽约知识分子圈中最热门的人物”^②。1989年，巴黎《周四大事件》周刊曾进行过一次调查投票，要求受访者依序罗列出五位最具知识影响力的人物，票选结果，鲍德里亚名列第八，与吉尔·德勒兹旗鼓相当，而且位列布尔迪厄之前。^③同年，在美国蒙大拿州举行了第一届“鲍德里亚研讨会”，会议内容于1992年结集成册，加深了英语世界对鲍德里亚的兴趣和理解。^④2000年，SAGE出版社编纂了“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丛书，其中《让·鲍德里亚》卷由其重要研究者迈克·甘恩编写，共计收录了88篇深入研读鲍德里亚思想的论文。^⑤2003年7月，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刊登文章《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扼要介绍了包括德里达、乔姆斯基在内的十二位学者，鲍德里亚赫然在列。文章将鲍德里亚定义为一个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预言家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将他的工作概括为“毫不退缩地去解释在今天这个麻木的卡通化的世界上生存

① 笔者注：南铁大学（Nanterre），即巴黎第十大学，并非法国西部的南特大学（Nantes）。

② Brian Rotman, *Who is Baudrillard*, *Guardian* 1988.9.21. Cited from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7.

③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

④ See, William Stearns (ed.), *Jean Baudrillard: the disappearance of art and politics*, Basingstoke & Hampshire: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2.

⑤ See, Mike Gane (ed.), *Jean Baudrillard*, London & Thousand Oaks: SAGE 2000.

的意义”^①。

有趣的是，鲍德里亚终其一生都在拒绝被定义，反而倾向于将自己隐藏在诸多变貌的背后，他描述自己的学术经历为“二十岁是荒诞玄学家——三十岁是情境主义者——四十岁是乌托邦主义者——五十岁横越各界面——六十岁搞病毒和转喻”^②，关于自己的身份，他说：“理论家？是的。形而上学家？也许。伦理学家？我不知道”，而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学院派的，但它也并不因此而更具文学性，它在演变，它变得比较不那么理论化，也不再费心提供证据和引用参考”^③。这样一种对学院的疏离态度和自觉的边缘化做法，是十分值得玩味的。正如理查德·兰恩所描述的那样，“鲍德里亚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最著名的书写者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就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它的具象化”^④。尽管被指斥为知识恐怖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荒诞而肤浅的批评家，他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原创性和冲击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向英语圈输出知识最多的法语作者之一。从1968年到2000年前后，三十余年间，他写作了20多部专著和20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当今时代的各个领域：战争、恐怖主义、信息、摄影、街头涂鸦、建筑、克隆技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身体和性、电视和网络，等等，而他写作的样式和风格，也被认为是同期法国哲学家当中最接近尼采的一个——没有批评或方法上的建议，没有学院式规条的束缚。^⑤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天马行空式的人物，我们将如何探究呢？

① Andrew Hussey, *Great thinkers of our time - Jean Baudrillard*, New Statesman 14 July 2003. Cited from the internet: <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307140020>. 译文参考自黄文前《新政治家》，评说当代重要思想家，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

② 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3.

③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43.

④ Richard J. Lane, *Jean Baudrillar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

⑤ Paul Hegarty, *Jean Baudrillard: Live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1.

还是从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期开始吧。

一 鲍德里亚生平及学术分期

让·鲍德里亚，1929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Reims）地区一个公务员家庭。他的祖辈务农为生，父辈成为城镇居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成长当中并没有太多知识分子背景和文化氛围，他说：“我是家族当中头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①在谈及与父母的关系时，鲍德里亚用到了“决裂”这样的字眼，并将其解释为自己学术生涯当中某种内在决裂状态的基点。鲍德里亚似乎刻意保持着对周遭世界的警惕与疏离，“决裂”是其一生的关键词，他决裂的对象包括：他的父母、大学、政治世界、他的导师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福柯和后现代主义等。然而，如果要为这一系列决裂找一个转捩点，那就不得不提及1968年五月风暴，因为正是在此后，鲍德里亚开始反思并自觉疏远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他对现实的关注视角也正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一次访谈中，鲍德里亚声称，“边缘正是知识分子的诞生之处。边缘才是知识分子们真正该在的地方……总是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许并无必要，它或许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更不是他们的天职——尽管有人说它是的——不过让我们这么说吧，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承载者”^②。可以说，这番话是鲍德里亚对自己理论使命的宣言：如何肩负起这个世界的否定性，如何刺痛这个时代，恐怕是鲍德里亚一生的母题。

1968年五月风暴是当时法国学生对丰裕社会的抨击和批判，

^① Jean Baudrillard, *I Don't Belong to the Club, to the Seraglio: Interview with Mike Gane and Monique Arnaud*, in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9.

^② Jean Baudrillard, *Intellectuals, Commitment and Political Power: Interview with Maria Shevtsova*, in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75.

但却是一次很难定义和评价的革命事件。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无法为之命名，而只能用一个中性的无内容的“Mai 68”（1968年5月）来称呼它。这次事件的矛头并不指向政治权力，而是，毋宁说，针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针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是说，它从本质上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这就正如齐泽克所认识到的那样：“1968年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是对其整体的否定。”五月风暴的主旨在于反对工业社会所导致的社会异化、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要求再次唤回人的解放和自由。这场运动及其失败对法国知识界的冲击是深远而巨大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德里达甚至将其视为一次哲学事件，认为尽管五月风暴不是以一部作品或一篇专题论文为形式，但是，

事实上它对一种社会性的或散漫的政体作了实践性的质疑，而有些人则感兴趣于使这个政体自然化而非历史化，这一质疑是通过动摇这种政体或参与对它的改革来进行的，对这些结构的真实性进行质疑也是一种哲学事件，或是对哲学事件的一种许诺。不管人们知道与否，或愿意与否，它总是使哲学发生了变化。^①

的确，五月风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陷入到某种无望当中，这不仅仅是对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的无望，更是对整个西方民主体制和政治世界的无望。他们意识到理论对现实干预的无力，意识到自身介入社会实践的苍白，而这最终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面撤离，他们不再活跃于历史舞台，转而退回学院，回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书斋生涯。拉康曾对参加抗

^①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配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7页。